

# 宗教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谢志海<sup>1</sup>

(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由美国核心文化 WASP 和“公民宗教”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 尤其是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信仰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使得宗教的影响力相比别国而言更容易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宗教价值观念是“美国例外论”和“天命观”的主要根源, 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威尔逊主义”外交理念, 进而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造成影响, 并形成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国内宗教团体利用广泛的社会资本, 通过民主的渠道, 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中并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传教士利用自身对对象国的了解, 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 并有可能受邀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外交决策。

**关键词:** 宗教; 美国外交; 宗教价值观; 宗教团体;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D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0)06-0032-08

宗教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尤其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那么究竟宗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呢?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宗教与美国外交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 试图概括出宗教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里奥·P·瑞布弗(Leo P. Ribuffo)认为,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美国宗教与外交的历史关联: 第一, 宗教信仰通过什么方式使得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国家并且在世界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第二, 国内宗教“利益集团”和国外宗教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 第三, 宗教观念, 包括那些深奥的神学教条对那些利益集团、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多大影响; 第

四, 宗教因素的这种对外介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宗教生态。<sup>1</sup> 以此为基础, 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 可以从下四个方面来考量宗教如何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 第一, 美国的宗教性, 即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二, 宗教教义和宗教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引导作用; 第三, 持各种道德价值观的宗教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议程和外交政策立场的影响; 第四, 传教士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

## 一、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即美国人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及宗教与宗教意识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宗教能够深刻影响美国

收稿日期: 2010-04-06 修订日期: 2010-05-20

作者简介: 谢志海(1982—), 男, 湖南衡阳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外交政策。

<sup>1</sup> Leo P. Ribuffo,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Elliott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Rowan & Littlefield 2001 pp. 1-2

外交的社会文化基础。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首先表现在作为美国核心文化的 WASP, 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亨廷顿 (Huntington) 指出, 虽然美国核心文化中某些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受到挑战, 但新教价值观却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sup>1</sup> 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是在美国早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 宗教性始终是美国国家特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宗教力量的强弱虽然有所起落, 但并未消退, 始终表现出较为兴盛的宗教态势, 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复归运动上。迄今为止, 美国历史上共经历了四次宗教复兴运动, 即四次大觉醒, 并且每一次都与重大政治改革相关联。<sup>2</sup>

美国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 上帝是美国文明的核心要素。从早期美国历史进程来看, 说美国是以宗教立国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独立宣言》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约翰·加尔文教义为核心的清教主义信仰。<sup>3</sup> 这种清教思想在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中就已经有所体现。1620年, 美国的移民始祖、首批离开欧洲的清教徒难民在威廉·布雷福德牧师的率领下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他们历尽艰辛, 冒险横渡大西洋, 来到北美这片蛮荒之地谋求生存。靠岸前, 他们签订了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基石的“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立誓要“弘扬上帝的荣耀, 推进基督的信仰, 同舟共济, 以契约形式组成政府”。<sup>4</sup> 建设“山巅之城” (city upon the hill) 也反映了宗教思想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体现。1630年, 马萨诸塞殖民地首任总督约翰·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 在从英国开往北美大陆的“阿尔培拉”号上向广大移民布道时说: “我们将发现上帝的以色列在我们中间……上帝使他成为新英格兰: 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作为‘山巅之城’。”<sup>5</sup> 他认为美洲大陆即将建立的新社会将是一座上帝赋予的“山巅之城”, 摆脱欧洲的政教腐败, 成为世界仰慕的模范生活方式。<sup>6</sup> 在美国早期社会建设中, 教会也处于重要的地位, 新社区的建立一般都是首先建立教堂, 然后围绕教会建设其他社会

设施。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等著名的世俗大学, 在以前也都是宗教院校。到 19 世纪上半期, 伴随美国扩张运动的兴起, 清教徒时期的使命感, 更发展成为“天定命运论” (Manifest Destiny)。1845 年, 《纽约晨报》的出版商兼民主派外交官约翰·奥沙利文 (John O'Sullivan) 最先提出“天定命运论”的口号, 宣称“美国通过天定命运的权利来扩展和拥有上帝赋予的这片大陆”<sup>7</sup>。按照这种理论, 美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 美利坚民族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典型代表, 是上帝所选定的优秀民族, 注定要向北美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展, 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 是一种天定命运。从美国早期历史进程来看, 宗教性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深刻植根于美国国家特质中, 也已经反映在美国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认知中。罗伯特·贝拉 (Robert N. Bellah) 于 1967 年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首先系统地提出“公民宗教” (civil

<sup>1</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2 页。

<sup>2</sup> 美国历史上四次宗教大觉醒包括: 第一次大觉醒 (1730—1760 年), 北美殖民地人民达成了以清教徒思想为核心的宗教共识, 为随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大觉醒 (1800—1839 年), 在复兴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上, 将善恶标准的应用扩展到批判奴隶制和废奴问题上, 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三次大觉醒 (1890—1930 年), 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别和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的发展为主要特征, 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 第四次大觉醒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以福音派的复兴为主要标志的宗教复归, 与对越战和尼克松政府的抗议以及八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改革相联系。[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65—67 页; 刘澎: “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美国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第 49—50 页。

<sup>3</sup> 王缉思: 《《美国宪政历程》序言》, 《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78 页, 原载任东来等著: 《美国宪政历程: 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

<sup>4</sup> “Mayflower Compact” (Nov. 11, 1620), Jack P. Greene, ed., *Settlement To Society, 1584—1763 Vol I: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Macraw—Hill Company 1966 p. 29.

<sup>5</sup> David A. Hollinger Charles Capper,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 Source Book*, Volume 8: 1620—186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9 p. 15

<sup>6</sup> “山巅之城”的观念后来成为早期美国外交孤立主义的一个思想根源, 即美国坚守上帝赋予的家园, 但也不去干预这个美好家园以外的喧嚣尘世,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sup>7</sup> Leo P. Ribuffi, op cit, p. 4

religion)的概念,深刻揭示了美国人对世俗和宗教相互关系的理解。<sup>1</sup> 将世俗政治与宗教社会结合起来,使宗教信仰与爱国精神互相支持和印证,这便是“公民宗教”<sup>2</sup>。

看一看宗教在今天美国社会的现状。虽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指出美国社会构成的日益多元化,已经对美国传统的核心文化,即 WASP 文化构成挑战和威胁,但基督教仍然在美国社会占据重要地位。从种族上看,传统的白人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但从宗教上来看,相比欧洲的世俗化,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的发展使所谓的世俗化理论一再受到挑战。<sup>3</sup> 在美国有 30 万个教会和两千多个教派组织,90% 以上的美国人称相信上帝,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sup>4</sup> 根据 2008 年 6 月的一项调查,有 70% 的美国教徒深信死后能够得到永生。<sup>5</sup> 此外,美国人均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人花在宗教活动上的时间和金钱也远比花在体育方面的多。据统计,1990 年,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美国人为 3.88 亿,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为 5.2 亿,是观看体育比赛总人次的 13 倍。1992 年,美国人花在宗教事业上的资金总额为 567 亿美元,而花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大球赛上的钱是 40 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14 倍。<sup>6</sup>

与欧洲的情况相比,美国宗教发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宗教意识和宗教力量在现代美国社会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不仅如此,美国宗教的政治积极性和社会渗透力,也使欧洲国家的教会望尘莫及。正如艾伦·D.赫茨克(Allen D.Hertzke)所断言:“人们如果不了解宗教对美国政治的介入及其动力,便不能充分了解美国政治。”<sup>7</sup> 虽然政教分离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宗教对美国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渗透力仍不可忽视。美国人甘于接受上帝的统治,就像里根所说,“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统治,我们就一定会被暴政统治”<sup>8</sup>。一句话,美国是一个有着世俗政府的基督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这就是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山巅之城”、“天定命运”、

“公民宗教”等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内涵的话语也已经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灵魂中,成为现代美国国家特质中的宗教性符号。这种宗教性既表现在无形的宗教认同感和宗教观念上,也体现为有形的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的存在,从而使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美国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之下,宗教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 二、美国宗教价值观与外交政策

有学者认为,宗教价值观为外交政策提供一种终极的视角、宽广的标准、灵感、动机、敏感性、警示以及道德限制。<sup>9</sup> 乔治·凯南(George

<sup>1</sup> Robert N. Bellah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96 (1) (Winter 1967), pp. 1-21.

<sup>2</sup> “公民宗教”包括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美国的政体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第二,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第三,宗教言辞和象征遍布美国公共言论和礼仪中;第四,国家重大典礼和活动本身具有宗教气氛,并履行宗教功能。[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86-87 页。

<sup>3</sup> 世俗化理论(Secularization)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将会逐渐减弱甚至萎缩,退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而实际是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宗教呈现复兴态势,于是以彼得·伯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世俗化理论提出质疑,提出与此相对的“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观点。彼得·伯格等著,李骏康译:《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sup>4</sup> 刘澎著:《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 页。

<sup>5</sup> “Survey Shows U. S. Religious Tolerance”, Survey by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http://www.nytimes.com/2008/06/24/us/24religion.html?\\_r=2&scp=1&sq=religion%20ir%20diplomacy&st=cse](http://www.nytimes.com/2008/06/24/us/24religion.html?_r=2&scp=1&sq=religion%20ir%20diplomacy&st=cse)

<sup>6</sup> 张敏谦著:《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时事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 页。

<sup>7</sup> [美]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等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 页。

<sup>8</sup> 原文为 “If we are not ruled by the God we must be ruled by tyranny”, 罗纳德·里根 1983 年在美国全国福音派联合会年会上的演讲。“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delivered on March 8 1983. <http://www.americanhetoric.com/speeches/ronaldreaganevilmpr.htm>.

<sup>9</sup> John C. Bennett *Foreign Policy in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New York: Scribners 1966, p. 36

Kennan)也宣称,虽然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直接反映宗教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价值在美国外交关系中没有影响力。<sup>1</sup>实际上,宗教价值观在美国外交历史中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sup>2</sup>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映,最突出的就是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渗透到政治外交层面而形成一种传教士式的外交理念。米德将这种美国外交理念归纳为,以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为代表的“威尔逊主义”。

这种基督教普世主义是美国人的例外论和天命感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使他们深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罗纳德·里根在他的一次演讲中称:“我们是一个深信有应许之地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深信我们被上帝选中来创造一个更伟大世界的民族。”<sup>3</sup>这是美国总统对美国人选民意和天命感最直接最坦白的表达。而宗教价值观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最直接有效的便是作用在总统等最高决策者的外交思维上。美国历史上至今尚无非基督徒总统的先例,并且除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以外,其余均为基督新教徒。<sup>4</sup>已经有学者论证宗教价值观在总统们的政治生活和外交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sup>5</sup>“例外论”和“天命观”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基础。李普赛特(Lipset)在谈论“例外论”时着重强调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包括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特征所产生的根本影响。<sup>6</sup>约翰·尤迪思(John B. Judis)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实践反映了美国人的三个基本观念:第一,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第二,美国有改变世界的使命;第三,美国在执行这项使命的过程中代表了惩恶的正义力量。<sup>7</sup>这三个观念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天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集中体现,其根源便是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

意识形态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sup>8</sup>美国的意识形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和特色:其一是“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包括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执著信念,其二是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美国外交政策经常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在基督新教天命观的支配之下,对外输出自由、民主、人权

等价值观念。这便是“威尔逊主义”的基本逻辑。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产物,而“美国信念”的主要思想,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也几乎全都源于基督新教思想,<sup>9</sup>所以这两个方面又通过基督教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强烈的天命意识必然要求其向世界推广它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主张在基督降临前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后千禧年主义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督教思想。<sup>10</sup>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 Tumer)在1893年曾说过,

<sup>1</sup> George F. Kenna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5-1986 pp. 205-218

<sup>2</sup> Leo P. Ribuffi 就列举了宗教价值观如何影响美国历史上诸如“一战”、“二战”、“越战”等重大外交决策,参见 Leo P. Ribuffi,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Roman & Littlefield 2001, pp. 1-27; 类似的研究还有 John W. Robbins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Trinit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0 pp. 1-12

<sup>3</sup>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83页。

<sup>4</sup> John W. Robbins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Trinit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0 p. 11.

<sup>5</sup> 艾森豪威尔原为非教徒,出于政治需要后来加入长老会。雷田雨著:《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sup>6</sup> Gary Scott Smith *Faith and the Presidency: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7</sup>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pp. 60-67.

<sup>8</sup> John B. Judis “The Chosen Nation: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Policy Brief*, No. 37, March, 2005 pp. 1-7

<sup>9</sup> 杰里尔·A. 罗塞蒂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最普遍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决策观点”。[美]杰里尔·A. 罗塞蒂著,周启朋、傅耀祖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sup>10</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58页。

<sup>11</sup> “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 或 Chiliasm)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认为会有一个千年的和平即千禧年国的到来,届时地球变成天堂,耶稣基督将再临人世,并进行最后的审判。分“前千禧年主义”和“后千禧年主义”。“前千禧年主义”认为基督降临在千禧年国到来之前。所谓“后千禧年主义”就是在基督降临于千禧年国之后,因而它号召教徒在基督降临前用基督教义去改造世界。

“扩张力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sup>1</sup>而笔者认为，美国人的扩张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基督教后千禧年主义改造世界的使命感。这种扩张力表现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尤以输出价值观念、充当世界警察等美国外交喜好为突出表现。

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是一种与“威尔逊主义”类似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原则。基督教现实主义谋求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秩序和正义”，对世俗观做出批判和谴责。基督教现实主义这种以“正义使者”自居的想法，也表现在美国决策者诉诸宗教来证明其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正当性上。杜鲁门总统在做出决策时这样说到：“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使用原子弹的责任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祈祷他将指引我们按照他的方式、为了他的目的来使用原子弹。”<sup>2</sup>尼布尔对此这样评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事业是不正义，相反，我们实际上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sup>3</sup>国际政治现实主义集中表现在忠于物质利益的权力政治上，而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不妥协的思想性现实主义，其实质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的外交理念。尼布尔在阐释基督教现实主义时说：“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对错的试金石是错误的，自私和自利不能代替理想主义。”这种宁愿舍弃物质利益，不愿妥协意识形态的外交理念曾经深刻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sup>4</sup>

### 三、宗教团体与外交政策

目前，美国共有 250 多个不同的宗教派别，222 万多个地方性教会团体。<sup>5</sup> 这些宗教团体包括各自的教徒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广泛的横向联系，构成了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络，这使得美国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sup>6</sup> 研究美国宗教的学者刘澎认为，宗教团体作为民间最主要的社会网络中心，是美国社会资本的最大占有者。<sup>7</sup> 正因如此，许多宗教团体，尤其是宗教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通过美国政治的民主程序，或多或少

地对政治与外交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在美国，教会的政治化和利益化倾向是美国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为了使其各自的价值观念和观点立场在外交政策中得以采纳，往往会有影响政治与外交的意愿，从而通过动员教徒和游说政客等方式对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尤其是一些全国性的宗教团体，它们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通过对下动员社会群众、对上游说议员，能够对许多国家政策和对外政策施加影响。<sup>8</sup> 总的说来，宗教团体以三种方式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第一，通过实体机构的力量对政府和国会施压来影响外交决策；第二，通过向决策者宣传和灌输宗教观念来影响外交；第三，通过海外服务，尤其是人道主义救援影响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外交关系。<sup>9</sup>

当然，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都具有影响政治和外交的意愿。宗教团体对政治与外交决策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与宗教教派也有密切关系。米德 (Mead) 认为，考察基督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可以大体将基督新教可分为三大类别，即基

<sup>1</sup> 唐晋主编：《大国的崛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页。

<sup>2</sup> Hilary Ehendorf, "Divine Intervention: American Religious Narratives of the Atomic Bombings, the End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Allied Occup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60 COE Special Edition 2007, pp 111-112

<sup>3</sup> Reinhold Niebuhr, "Our Relations to Japan",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September 17, 1945.

<sup>4</sup> J Bryan Hehir, "Religion, Realism, and Just Intervention", in E. J. Dionne et al., *Liberty and Power: A Dialogue on Relig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just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 15-19.

<sup>5</sup> 吕其昌：“美国宗教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国际论坛》，2003年1月，第69页。

<sup>6</sup> 刘澎：“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55页。

<sup>7</sup> 同<sup>6</sup>，第38页。

<sup>8</sup>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宗教觉醒”，一些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在美国陆续建立，其中“基督教联盟”是1989年成立的最大宗教右翼组织。徐以骅：“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2-223页。

<sup>9</sup> Mark R. Amstutz, "Faith-Based NGO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Rowan & Littlefield 2001, pp 176-182

要派 (Fundamentalists)<sup>1</sup>、福音派 (Evangelicals) 或基督教保守派,<sup>2</sup> 以及基督教自由派 (Liberal Christian)。由于这三者的宗教世界观的差异, 造成了它们对介入政治生活的意愿存在很大差别, 因而对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力也不相同。其中自由派对政治与外交事务的影响最大, 基要派最小, 福音派居中。”但由于自由派世俗化越来越严重, 因此其影响力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音派的复兴使得它开始大规模介入政治,<sup>3</sup> 形成政治上的“宗教新右翼”<sup>4</sup>。自那以来, 福音派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生活, 对政治生活与外交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教派体系上来说, 基督教保守派以福音派为主, 还包括基要派、灵恩派、五旬节派、复临派等。值得一提的是, 1960—2003 年, 美国基督新教中七大主线教派 (Seven Mainline Denominations) 的会员从 2900 万减少到 2200 万, 减少近四分之一; 七大主线教派的会员占美国宗教团体会员总人数的比例也从 25% 下降到 15%。<sup>5</sup> 可见, 宗教信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化, 这表明美国基督教内部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 这种宗教多元化意味着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的影响力。

宗教团体和宗教势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对外交政策议程的影响, 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宗教自由和人权干预政策的实施。在宗教右翼的推动之下, 1997 年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沃尔夫—斯佩克特法” (the Wolf-Specter Bill), 即“消除宗教迫害法案”, 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自动对实施宗教迫害的国家实行制裁等强硬措施。1998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RFA), 并宣称美国政府“已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sup>6</sup>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规定设立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 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 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 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等。在这种机制化的宗教势力的影响之下, 美国外交政

策的议事日程更容易受到宗教影响。推进所谓海外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不仅如此, 宗教团体还将鼓吹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政策挂钩。例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托马斯·F. 法尔在 2008 年三四月份《外交》双月刊上呼吁美国外交应当使“保护和扩展宗教自由成为其核心因素之一”, 并宣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sup>7</sup>。

## 四、传教士与外交政策

传教本身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日程, 但传教士的工作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传播福音。正如米德所说, 美国的传教活动是美国外交政策中部分“被忘却的历史”, 它绝不仅限于某个或

<sup>1</sup> 基督新教基要派, 亦作原教旨基督教, 是基督教内带有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运动, 主要特点为: 深信圣经的每一句话语, 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持反对立场, 对现实世俗世界持悲观态度。

<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米德用的英文是 Evangelicals, 即“福音派”, 但此处的“福音派”实际上是对基督教保守派的泛指, 不仅包括福音派, 也包括从基要派和其他教派来的宗教保守派。由于基督教保守派十分热衷于传福音, 因而人们用“福音派”泛指基督教保守派。刘澎: “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美国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第 34 页。

<sup>3</sup> 米德指出, 基要派对世界秩序的前景持完全悲观的态度, 并且十分强调教徒与非教徒的区别; 自由派则相反, 对世界秩序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 并且不强调基督徒与非教徒之间差别; 而福音派的宗教世界观则介于两者之间。Walter Russell Mead “God’s Country? Evangelical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6, Vol. 85 Issue 5 pp. 24–43.

<sup>4</sup> 学界一般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宣布公立学校祈祷和朗读圣经为违宪, 1973 年最高法院关于堕胎合法的判决、公立学校的性教育、争取同性恋和妇女权利运动以及水门事件等, 是触发福音派大规模介入政治生活的导火线。

<sup>5</sup> 值得指出的是, 基督教保守派 (Christian Conservative) 与基督教右派 (Christian Right) 或宗教右翼 (Religion Right) 的概念存在某些细微差别, 基督教保守派的提法是从宗教角度相对基督教自由派所做的划分, 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翼则不仅表示神学上的保守, 而且包括社会政治观上的保守, 二者指的是同一回事, 但侧重点不同。

<sup>6</sup> Walter Russell Mead, op. cit., pp. 36–37.

<sup>7</sup> 徐以骅: “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 任晓, 沈丁立主编: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第 247 页。

<sup>8</sup> Thomas F. Far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Faith: 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8, Vol. 87 Issue 2 pp. 111–112.

所有教派的宗教布道行为,还包含了无数美国人的宗教工作、医疗工作、救济工作和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sup>1</sup> 与国内宗教团体不同,传教士的特征在于,他们直接身处对象国的环境之中,有的甚至在对象国长年生活,因而对对象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对对象国情报的掌握、对对象国民族脾性的把握、在对象国拥有的人脉甚至与重要外交人物的联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些优势均可被发挥利用来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

首先,传教士成为外交决策者的情报来源之一。例如,涉及冷战时期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政府通过教会团体资助代表团和调查团去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传教士反馈的调查报告成为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主要情报来源之一。<sup>2</sup> 其次,传教士也经常参与到美国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中。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创始人、194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约翰·R·穆德,就曾颇受美国政治家的青睐,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甚至曾经任命他担任美墨和美俄外交谈判代表。<sup>3</sup> 而在对日占领时期,麦克阿瑟的智囊团里则包括了大批的传教士。<sup>4</sup> 另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传教活动甚至可以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紧密相关。殖民主义时代,包括美国在内的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向古老的亚非拉文明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帝国主义,同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结成了三位一体的侵略扩张势力。而“天定命运论”则成为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对外扩张的神圣依据。塔夫脱总统盛赞传教士的活动“比一切条约和国际法庭都更有效”<sup>5</sup>。难怪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激进基督教的一种自然演化。<sup>6</sup>

在一定情况下,传教士还能影响到美国对外政策的某些重大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7年,传教士为了达到保护教会财产的外交目标,试图说服威尔逊不对德国“一战”期间的盟国奥斯曼帝国宣战。他们告诉白宫,宣战意味着教会拥有的巨大教育体系将被迫关闭,教会财产也许会被没收;并且,在血腥的宗教暴力

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国际保护。威尔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结果是美国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传教士们得以继续经营和管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学校和教会。<sup>6</sup>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传教士在“二战”后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决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在1943年,曾在日本传教的基督教领袖卢曼·舍尔弗(Luman J. Schafer)就邀请了一批美国宗教领袖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会议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包括警告美国政府撤销天皇制的危险性。<sup>7</sup> 1945年对日占领开始后,应麦克阿瑟将军之邀,杜鲁门政府召集了四位有过在日传教经验的著名传教士领袖,其中包括卢曼·舍尔弗,组成了一支特别代表团赴日本进行交流访问。他们的访日报告也一致建议美国政府保留日本的天皇制。<sup>8</sup> 另外,传教士们与日本知名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等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使得他们成为麦克阿瑟与日本皇宫之间的联系人,在麦克阿瑟与天皇的会见等磋商中发挥了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这一系列传教士们的活动,与美国对日外交的其他努力一道促成了战后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战略决策。

<sup>1</sup>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sup>2</sup> [美]艾伦·D·赫茨克著,徐以骅等译:《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sup>3</sup> 雷雨田著:《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sup>4</sup> Charles W. Igler,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Japan*, Tokyo Rinsen Shoten, C. E. Tuttle Co., 1959, pp. 273-274

<sup>5</sup> 同<sup>4</sup>,第52页。

<sup>6</sup> John W. Robbins, op. cit., p. 7

<sup>7</sup> 同<sup>2</sup>,第157页。

<sup>8</sup> Ray A. Moore and Donald L. Robinson, *Partners for Democracy: Crafting the New Japanese State under MacArth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7

<sup>9</sup>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Document 15, October, 1945, *Truman Paper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5, pp. 61-71

## 五、结论

综上所述, 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第一, 美国是一个宗教立国的国家, 由美国核心文化 WASP 和“公民宗教”所塑造的美国国家特质的宗教性, 尤其是美国人强烈的宗教认同感以及宗教信仰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 使得宗教的影响力相比别的国家而言更容易渗透到其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中。第二, 宗教价值观念尤其是宗教普世主义价值观是美国人的例外论和天命观的重要思想根源, 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威尔逊主义”外交理念, 对美国总统等外交决策者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造成直接影响。“威尔逊主

义”在对外政策中突出表现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和对外输出民主价值观念的政策偏好。第三, 国内宗教团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本, 通过民主的渠道, 将自身的政策主张上升到外交决策层面, 尤其是宗教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等活动不仅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议事日程, 甚至还有可能左右外交决策的结果。第四, 传教士除了在对外宗教问题上产生影响以外, 还能利用自身对对象国的了解, 为外交决策者提供情报, 并有可能被邀请加入到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中, 某些情况下还能在一些重大外交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责任编辑 薛迎春

##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XIE Zhihai<sup>1</sup>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wning to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i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forged by American core culture WASP and “civil religion”, religion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American social life; thus religious power penetrates into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ore easily in America than in other countries. Religious values are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messianism. Religious values contribute to one of the guiding tene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amely so-called “Wilsonianism”, and make exporting democracy and other western ideologies a priority in its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religious groups use their social capitals and the democratic channels to express their standpoints and views. Thus they are able to exert certain impacts on the setting of foreign affairs agenda. The missionaries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s in local nation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and advices to the decision-makers. Sometimes missionaries can be invited to jo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influence even some critical deci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relig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ligious values; religious groups; missionaries